

## 盛世才與中共（民國26年至31年）

高素蘭

### 摘要

盛世才為鞏固政權，取得蘇聯援助，實行親蘇政策，因而對中共表示親善。共軍侷促於陝北等地，在遭國民政府中央軍圍剿，走投無路之際，於「長征」途中計畫進入新疆，由於盛世才態度左傾，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同意中共西路軍餘部進入新疆。

抗戰初期，蘇聯以大量軍火接濟中國，通過新疆運往內地，同時也接濟中共。中共除了在新疆設立第八路軍辦事處，作為蘇聯與中共聯絡站外，並利用新疆生活安定之環境，配合新疆軍官學校的教學上便利和軍事裝備，積極培訓軍事幹部。

為強化在新疆工作，中共中央派代表與盛世才商談合作，盛世才委以各種要職，盛世才以緩和中央觀感與適應新疆社會發展為由，要求中共人員在新疆不能宣傳共產主義與發展黨務組織，不能公開黨員身分，只協助建設新疆。但中共卻利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和《新疆日報》宣傳反日、馬克思主義，爭取群眾，使盛世才坐立不安。

民國28年時新疆尚須蘇聯援助，所以盛世才對中共採取疏遠辦法，待德蘇戰爭爆發，蘇聯為加強戰備，對新疆壓迫，及至盛世才四弟盛世騏被暗殺，盛世才乃決定反蘇反共。民國31年盛世才決定歸順中央，逮捕拘禁中共黨員，直到民國35年由於張治中的協助，此批人員始返回延安。

**關鍵詞：**新疆、盛世才、中共、蘇聯

# Sheng Shih-ts'ai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1937-1942 )

Kao Su-lan

##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o acquire the support from the Soviet Union, Sheng Shih-ts'ai implemented the pro-Soviet policy and ha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sieged by Nationalist Army and was blockaded in Northern Shansi, the CCP began the Long March and intended to go to Sinkiang. As he swung to the left, Sheng Shih-ts'ai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ist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the CCP, and permit CCP's remnant troops entering Sinkia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Soviet Union had supplied China with a large amount of weapons through Sinkiang. The CCP also benefited from it. Besides setting up an office of the Eighth Army in Sinkiang to contact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CCP also made use of the stable environment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to train their own military staff.

To enforce the activities in Sinkiang, representatives from CCP's headquarter were sent to discuss cooperation with Sheng Shih-ts'ai. In return, Sheng asked the CCP not to promote communism or develop organizations, and also forbade them to declare their party membership, so as to soothe the government and stay in tun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Sinkiang. However, the CCP manipulated such as the Sinkiang Daily to promote the anti-Japanism and Marxism and to endeavor after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These greatly unnerved Sheng Shih-ts'ai.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was indispensable to Sinkiang in 1939, therefore Sheng Shih-ts'ai adapted a remote approach toward the CCP gradually. After the break of German-Soviet War, the Soviet Union raised the alarm and threatened Sinkiang. Not until Sheng Shih-chi, Sheng's fourth brother, was assassinated, did Sheng Shih-ts'ai decide to go against the communist completely. In 1941, Sheng Shih-ts'ai paid homag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rrested the CCP members in Sinkiang. They were set free and returned to Yanan through the help of Chang Chih-chung in 1946.

**Key words:** Sinkiang, Sheng Shih-ts'ai,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oviet Union

## 盛世才與中共（民國26年至31年）

高素蘭\*

### 壹、前言

盛世才與中央及蘇聯的關係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對其與中共的相互關係尚未有專論性的著作。張大軍在《新疆風暴七十年》一書，對中共在新疆的活動略有述及，然由於成書時間較早，許多後來陸續出版的史料未及參考引用，所以許多史事和觀點，有必要予以補充修正。近來中國大陸對於中共在新疆及其與盛世才關係的專著、論文相繼發表，其中數趙明所寫的〈盛世才與中國共產黨〉一文較為詳細，然政治意識型態濃厚，惟歷史事實尚可引用。

盛世才以東北客籍入主新疆，置身民族複雜、強鄰環伺、財政困難的惡劣環境中，實行親蘇政策，尋求蘇聯援助，以鞏固其政權。他利用中共的政策，對中共在抗戰時期勢力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此為撰寫本文的動機。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盛世才雖實行親蘇政策，但在民國25年之前，除蘇聯先後派聯共黨員幹部到新疆工作外，盛世才並未與中共直接接觸。然而，中共卻在遭國民政府中央軍圍剿，走投無路之際，而於「長征」途中計畫進入新疆；其後，盛世才又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同意中共西路軍餘部進入新疆，其間經過及中共人員在新疆與盛世才互動的情況等等。

本文在時間的斷限上，係擷取中共西路軍進入新疆至盛世才與中共關係惡化，逮捕拘禁中共人員，作為研究範圍。至於史料的運用上，除《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有關新疆問題的資料，並參考《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再輔以中外學者的相關論著，期能對盛世才與中共之關係，做一有系統的敘述和分析。

---

\* 國史館協修

## 貳、西北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

民國20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界各團體發起反日運動，北平學生赴南京請願，高呼「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等口號。民國21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挑釁，共軍乘機擴張，中央眼見抗日戰爭終不能免，為全力抗戰，乃確定「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積極統一內部。<sup>1</sup>

第五次圍剿後，中共在民國23年放棄贛南基地，由共軍主力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繞過西南向西北逃逸，希望能與蘇聯接近，可隨時接受蘇聯援助。民國24年11月，中央為對付將逃至陝北的共軍，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張學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率領的東北軍駐陝甘，擔任圍剿任務，並輔以楊虎城（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西北剿匪軍第三路司令）之西北軍、湯恩伯之中央軍，積極剿共。

蘇聯眼看一手扶植之中共瀕臨崩潰，同時對於日本著著進逼，蘇聯自身安全亦遭受嚴重威脅，中國抗日戰爭的成敗，不僅攸關中國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蘇聯的安危。民國24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全世界代表會議，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 M. Dimitrov）提議「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戰線」，中共據此發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以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為號召，逐步建立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sup>2</sup>藉此分散及緩和國軍的進剿；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口號，博取人民對中共的同情與擁護。<sup>3</sup>此後全國出現許多抗日團體，如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天津「愛國先鋒團」等，<sup>4</sup>形成全國性之抗日運動風潮。

中共最初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是「抗日反蔣」，民國25年7月，中共為加速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挽救其逃竄敗亡之命運，乃放棄「抗日反蔣」策略，實施「逼蔣抗日」的方針，公開要求國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sup>5</sup>中共的這些宣傳影響了坐鎮西安的張學良，張學良思考聯合中共、楊虎城，靠蘇聯幫助，形成「西北大聯合」之抗日局面。<sup>6</sup>

1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9年6月，12版2刷），頁352。

2 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2冊（臺北：國史館，民國79年6月），頁3、10、14。

3 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2冊，頁32。

4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頁360。

5 黃啟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6期，頁10；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2冊，頁28-31。

6 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頁67。杜重遠（盛世才之同學）根據東北軍主力集中陝甘的情況，對張學良提出之建議，並指出東北同鄉盛世才是可以合作的。另見許斌、史慰慈：〈張學良、杜重遠、新生周刊事件〉，《傳記文學》，第60卷第4期，民國81年4月，頁32。

民國25年7月14日，盛世才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七項救國綱領」，表明其政治立場：

- 一、必須全國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德精誠團結以救中國。
- 二、必須停止內戰，以最堅決的鬥爭反對侵略與瓜分中國。
- 三、全國各族各界同胞必須與一切漢奸作堅決的鬥爭。
- 四、對帝國主義必須拋棄不抵抗政策，而採取最堅決強硬之外交政策。
- 五、必須與外來之經濟侵略及走私運貨作堅決之鬥爭。
- 六、必須用一切力量發展本國經濟與農工商業。
- 七、必須遵照孫中山先生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救中國之危亡。<sup>7</sup>

其中所述「停止內戰」、「拋棄不抵抗政策」，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念相同。「七項救國綱領」與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提出的「八項條件」<sup>8</sup>亦有共通之處，由此可以看出西安事變前盛世才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態度。

在中央堅持安內攘外，抗日必先剿共之時，盛世才卻實行親蘇、反帝政策，指政府「先清內患後禦外侮的對外不抵抗主義，就是亡國主義。」<sup>9</sup>新疆因緊靠蘇聯，又盛氏之左傾政治態度，成為中共實現「以西北大聯合共同抗日促進全國抗日」的理想後方，故欲爭取盛世才參加。<sup>10</sup>民國25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達成停戰受編共同抗日的協議，<sup>11</sup>商定雙方派代表去蘇聯，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軍事、經濟上的物資援助；中共派代表由東北軍保護從新疆去蘇聯，並由張學良派人聯絡盛世才。<sup>12</sup>6月，中共派鄧發啟程經新赴蘇；8

<sup>7</sup> 盛世才：《目前政府主要任務》，第二部（新疆：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民國30年9月18日，改訂3版），頁87。

<sup>8</sup> 中共稱之為「八項救國綱領」。其內容為：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6.開放民眾愛國運動。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0年11月，30版），頁79-80。

<sup>9</sup> 盛世才：《六大政策教程》，第2分冊（新疆：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民國31年4月1日），頁52。

<sup>10</sup> 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67。

<sup>11</sup>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1年2月），頁11-12。協議內容為(1)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2)擔保不欺騙，不繳械。(3)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黨武裝同樣受點編。(4)取消紅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5)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事工作。(6)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7)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8)准其非軍人黨員，居住陝北。(9)待抗日勝利後，共黨武裝一如國軍，復員遣散。(10)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為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家然等等。見張學良：《西安事變反省錄》，轉引自張鴻銘：〈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反省錄》〉，《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6期（民國88年6月），頁303。

月末，張學良派栗又文去新疆，這期間中共、張學良、新疆之聯繫，雖係借道，但不失為爭取新疆之試探，<sup>13</sup>也是中共中央與盛世才最早的聯繫。由於盛世才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問題上與之是有共識的，<sup>14</sup>所以成為張學良與中共爭取的對象，新疆因此成為建立西北統一戰線之一環。

西安事變前（民國25年11月）張學良派代表至新疆與盛世才祕密接觸，盛世才「力主無條件的援張」。<sup>15</sup>及至事變發生，《新疆日報》立即發出紅字號外，擁護「八項條件」，<sup>16</sup>盛世才本想通電表示贊成，<sup>17</sup>嗣因蘇聯各報指責張學良、楊虎城製造混亂以利日本，破壞中國抗日力量之團結；<sup>18</sup>莫斯科共產國際亦電中共，指出西安事變將促使中央親日派與日本合作，對中共和蘇聯都不利，且違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sup>19</sup>盛世才未料及蘇聯竟不贊成，原認為「西安事變乃係中共得到第三國際的同情而策動的」，<sup>20</sup>然因當時新疆正需蘇聯援助，考慮利害後，撕毀擬好之電文，取消響應性言論，<sup>21</sup>並轉變態度謂：「此次西安事變，不但與新疆毫無關係，且亦絕不贊同。」<sup>22</sup>

盛世才如此出爾反爾，既不得罪中央，也不至和張學良弄僵，更不違蘇聯意思，影響其

<sup>1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次印刷），頁5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次印刷），頁306。

<sup>13</sup> 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68。

<sup>14</sup> 同前註，頁69。

<sup>15</sup>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致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書（譯文）〉，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出版），頁437。

<sup>16</sup> 安志潔（原名盛世同）：〈盛世才迫害妹夫俞秀松經過〉，《傳記文學》，第53卷第2期，頁27。

<sup>17</sup> 安寧：《新疆內幕》（新加坡：創墾出版社，1952年8月19日，初版），頁94。另見安志潔：〈盛世才迫害妹夫俞秀松經過〉，《傳記文學》，第53卷第2期，頁27。西安事變發生，新疆電台收到這消息，俞秀松即代盛世才擬發電報給張學良表示聲援。

<sup>18</sup> 如蘇聯《消息報》在14日發表〈張學良之暴動〉的評論，指出張學良的行動顯然只對日本有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應反對南京，而應和南京合作。轉引自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2冊，頁51；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71。

<sup>19</sup> 郭華倫編著：《中共史論》，第3冊（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58年9月），頁169-170。

<sup>20</sup> 「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3卷，《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21</sup> 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71。

<sup>22</sup> 〈盛世才覆新疆駐京代表張元夫電文〉，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西安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民國72年3月出版），頁405。另見《中央日報》（南京版），民國25年12月21日，版3。民國31年盛世才上蔣委員長書，辯稱給張學良之覆電亦表示「不參加不同情」之中立態度。見「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3卷，《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個人與新疆之切身利益，新疆依然是其勢力所在。

### 叁、中共西路軍餘部入新始末

由於盛世才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西北統一戰線及與蘇聯聯繫奠下基礎，允中共西路軍餘部入新疆後，盛世才與中共開始正式建立統一戰線。

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決定北上建立川甘根據地時，曾考慮過「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新疆，使能背靠甘、青、寧、新四省之廣大地區，以利向東發展。」<sup>23</sup>民國24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毛澤東指出，「新疆地理靠近蘇聯，政治、物質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砲，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所以要派支隊至新疆造飛機、造兵工廠……。」<sup>24</sup>後中共決定立足陝北，但對爭取新疆，經新疆與蘇聯取得聯繫之想法一直未放棄。

民國25年10月，中共紅四方面軍張國燾以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開國際路線」之名，指揮紅四方面軍第五、九、三十軍及總部二萬一千餘人，<sup>25</sup>西渡黃河，取寧夏、甘肅西部，冀走新疆依附蘇聯，中共中央授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路軍」之稱號（簡稱西路軍）。中央當然不會讓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蔣委員長曾電楊虎城：「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sup>26</sup>所以西路軍渡河後，在河西走廊遭馬步芳（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陸軍新編第二軍軍長兼第一百師師長）、馬步青（步芳之兄，青海省政府委員，騎兵第五師師長）之正規軍步、騎兵三萬餘人及十幾萬後備民團截擊，人數僅餘二千餘人，<sup>27</sup>情況危急，東西推進都不可能。為了營救西路軍，中共中央試圖以重金收買馬氏兄弟，指示周恩來，「對二

<sup>23</sup> 〈中央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四方面軍電〉（1935年6月16日），《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轉引自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68。

<sup>24</sup> 〈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決策〉（1935年6月28日），《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頁20，轉引自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68。

<sup>25</sup> 但能作戰部隊僅一萬三千餘人。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頁145。

<sup>26</sup> 〈蔣委員長令楊虎城痛切悔悟函〉，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民國72年6月），頁176；另見蔣介石致楊虎城書〈有關西安事變「陝甘善後問題」政治解決經過的函電〉（1937年1月19日），轉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1986年第4期，頁14。

<sup>27</sup> 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145。



馬不但十萬，就是二十萬或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須。」<sup>28</sup>希望馬氏兄弟不要阻攔、追擊；並電告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聯繫取得西路軍之援助問題。

民國26年3月中旬，西路軍敗走入祁連山，在石窩山頭舉行會議，決定將餘部分左、右支隊。<sup>29</sup>左支隊一千多人，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領，沿祁連山西行。鑑於新疆與蘇聯接壤，遠離中央統治中心，所以計劃進入新疆保存、發展力量；另方面盛世才為鞏固統治地位，實行親蘇政策，省政方面對蘇聯言聽計從，在共同抗日問題上又同意中共之主張，所以成為中共與之商談援濟西路軍入新之基礎。<sup>30</sup>而當時南疆正發生馬虎山變亂，省軍大部南調作戰，省城空虛，盛世才自忖藉西路軍可維持北疆安全，<sup>31</sup>自然同意西路軍入新。其實早在民國25年12月以前，時在共產國際工作之陳雲等已奉命自莫斯科到新疆，攜共產國際蘇聯支援之槍彈給養，準備接應西路軍，當至阿拉木圖時，發生西安事變，在那等待四個多月。<sup>32</sup>至民國26年4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才指示：「你們（西路軍）可去新疆，已電彼方（蘇聯）設法援接。」<sup>33</sup>

盛世才派飛機空運槍枝、彈藥、衣物、糧食等，由新疆督辦公署邊務處令星星峽邊務辦事處和邊卡駐軍，會同陳雲等迎接衣著不堪入目的四百餘名西路軍入新，這是盛世才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係的開始。

盛世才雖同意將西路軍餘部接進迪化安置，對中央採「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態度，<sup>34</sup>但畢竟他是中央任命的新疆邊防督辦，不便與中央翻臉，因此他不願西路軍公開身分，<sup>35</sup>將西路軍安置在一兵營裡，對外稱是新招募的軍隊，稱之為「新兵營」。盛世才並以避免中央注意及當地人民疑懼為由，<sup>36</sup>要求西路軍指戰員換穿新疆地方軍隊軍服，改番號，並限制與人民接觸。<sup>37</sup>中共為得休整之所，雖同意盛世才要求，但仍積極利用盛世才之統一

<sup>28</sup> 〈洛、毛、朱、張給周并彭、任電〉（民國26年3月27日），轉引自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頁17。

<sup>29</sup> 同前引書，頁8。右支隊被擊散，向祁連山東南走，許多指戰員被俘，部分人員分散返回延安。

<sup>30</sup> 郭林：〈西安事變與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疆歷史研究》，頁72。

<sup>31</sup> 朱培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其特點〉，《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頁189。

<sup>32</sup>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頁5-6。

<sup>33</sup> 〈軍委主席團給西路軍工委電〉（民國26年4月7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17。

<sup>34</sup> 呂黎平：〈紅西路軍進新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88。

<sup>35</sup>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頁20。

<sup>36</sup> 周東郊遺稿：〈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次印刷），頁38。



戰線政策，使新疆成為與國際往來的通道，及訓練幹部、學習特種軍事技術的基地。

西路軍進入新疆才兩個月，即逢抗戰爆發，形勢改變。首先是國共合作，<sup>38</sup>中央對中共壓力減輕，且國軍轉向日軍作戰，中共見情勢轉變，亦隨之變更計劃要西路軍留在新疆，令西路軍負奠定中共後方和接通遠方（蘇聯）的使命。<sup>39</sup>

為保持一條和蘇聯間物資、人員往來之通道，中共於民國26年10月在迪化設立第八路軍辦事處，<sup>40</sup>與當時其他各省之八路軍辦事處不同的是，該處不公開、不掛牌，對外稱「南梁第三招待所」。<sup>41</sup>

抗戰軍興，中國海上運輸線被日本切斷，新疆成為通往蘇聯的重要交通線。抗戰初期，蘇聯以大量軍火接濟中國，通過新疆運往內地，同時也接濟中共。<sup>42</sup>延安偏處陝北，交通梗阻，由延安經新疆至莫斯科是較便捷的路線；物資嚴重缺乏，所需之日用品、軍火、藥品、通訊器材等，均由蘇聯運迪化，經八路軍辦事處接收，再轉運至延安，<sup>43</sup>新疆成為延安的補給站。此外新疆亦成為中共與共產國際、蘇聯往來之要站，中共幹部前往蘇聯參加國際會議，匯報工作、治病、療傷都在新疆逗留，由八路軍辦事處負責接待、安排。民國28年，周恩來前往蘇聯治臂傷，路過迪化，曾與盛世才就雙方關係進行四次會談；<sup>44</sup>除周恩來外，先後路經新疆之中共要員有鄧發、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康生、林彪等多人。

中共除了把新疆第八路軍辦事處作為蘇聯與中共聯絡站外，並利用新疆生活安定之環境，配合新疆軍官學校的教學上便利，以蘇聯援助新疆的軍事裝備，把「新兵營」辦成一所多兵種的軍事技術學校，積極培訓能使用現代化武器設備，如飛機、裝甲車、火炮、無線電

<sup>37</sup> 胡曉光：〈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介紹〉，《烏魯木齊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頁9。

<sup>38</sup> 秦野風等著：《國共合作的過去與未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頁205。民國26年9月22日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委員長發表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和團結救國談話。

<sup>39</sup> 伊原吉之助：〈盛世才の新疆支配と毛澤民の死—抗日戦期中ソ關係の一齣—〉，收錄於竹內實編：《轉形期の中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88年3月），頁150。

<sup>40</sup> 民國26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臺北：蘭溪出版公司，民國69年10月），頁3996。

<sup>41</sup> 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3。

<sup>42</sup> 民國27年，時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長伍修權說，蘭州辦事處有一項繁重任務，即是接收並轉運來自蘇聯和新疆的各種物資。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頁170-171。轉引自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頁103。

<sup>43</sup>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3998-4001。

<sup>4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448。未載會談內容。

等的幹部。<sup>45</sup>因此著手組織西路軍指戰員，學習各種現代化軍事科學技術和政治文化，把「學好文化、學好技術、上前線打日本」作為共同的行動口號。<sup>46</sup>由於指戰員多為農民出身，文化程度低，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所以先開始文化學習，從延安派文化教員，送來學習教材，對學習情況給予重要指示。<sup>47</sup>學習半年後，轉而學習軍事技術。部隊分成四個大隊，第一大隊學裝甲，第二、第三大隊學汽車，第四大隊學炮兵；並選出二十五名入新疆航空隊學飛行和機械等航空技術，由盛世才聘請的蘇聯教官教授，盛世才並提供蘇製野炮、山炮、電話機等作為實習教材。<sup>48</sup>學裝甲的更以參觀名義，參加盛世才的聯合兵種演習，由蘇聯顧問不斷提供情況，累積各種經驗。<sup>49</sup>新兵營經過新疆兩年八個月之學習，對中共後來空軍、炮兵、機械化部隊的建設有很大的幫助。<sup>50</sup>

民國2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紅軍總司令朱德以前方需要甚急，令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將繼續留新疆學習的航空隊學員，和留守工作崗位部分幹部外的三百餘名「新兵營」指戰員全部撤回延安，<sup>51</sup>轉送前線參加抗戰。時中央軍令部認為新兵營人數僅三百餘，增加前方抗戰力量有限，因而建議下令盛世才將該部編入新省部隊中，勿使遠道跋涉。<sup>52</sup>盛世才則以新省經濟文化落後，該批官兵均係青年，又信仰共產主義，深恐言行或有不當，影響政府政策及落後社會民族之思想，不願新兵營久駐新疆，<sup>53</sup>請示蔣委員長，「為抗戰前途計，為顧及新省實際情形計，懇准遣送該部歸隊。」<sup>54</sup>後中央同意新兵營官兵徒手歸隊。<sup>55</sup>並依盛世才之請，由新疆省派員帶車直接護送至延安，准予途經陝、甘二省。<sup>56</sup>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因彭德懷部當時已在山西異動，而中共在陝北行動亦日趨積極，恐此次遣

<sup>45</sup> 黃玉芳：〈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鬥爭是全國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烈士傳通訊》，1991年第4期，頁25。

<sup>46</sup>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頁25。

<sup>47</sup> 莊嚴：〈西路軍餘部入新疆返延安鬥爭情況述略〉，《黨史研究》，1984年第4期，頁69。

<sup>48</sup> 宋承志、王德潤：〈新兵營的炮兵大隊〉，《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123。

<sup>49</sup> 蕭顯清：〈在新兵營的日日夜夜〉，《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94。

<sup>50</sup> 朱培民：〈再論中共與盛世才的關係〉，《新疆烈士傳通訊》，1990年第1期，頁24。

<sup>51</sup>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頁52。

<sup>52</sup> 〈徐永昌致蔣委員長電文〉（民國28年11月22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2；〈蔣委員長致盛世才電文〉（民國28年11月2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次印刷），頁260。

<sup>53</sup> 〈盛世才請張元夫向蔣委員長面陳徐向前部官兵回延安理由電文〉（民國28年12月1日），轉引自《天山風雲錄》，頁52。民國26至28年中共人員在新疆工作，積極爭取群眾，影響力日增。

<sup>54</sup> 〈盛世才致蔣委員長電文〉（民國28年11月30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3。

<sup>55</sup> 〈軍令部致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駐京辦事處電文〉（民國28年12月1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4。

返中共在新疆訓練成熟的幹部，非特影響抗戰，且將危黨國，所以要將該部扣留，<sup>57</sup>然中央恐引起盛世才的疑慮，電令遵照放行，不可扣留，<sup>58</sup>以免惹起糾紛。

## 肆、中共在新疆勢力的擴張

盛世才鑑於過去對新疆只強調其國防地位的重要性，而忽略地方建設，<sup>59</sup>認為新疆有豐富的資源，沒理由持續落後，為建設新疆所以起用中共人才，<sup>60</sup>而中共也藉在新疆之工作機會，打著「為鞏固抗戰後方、保證國際交通線」的口號，<sup>61</sup>在新疆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

由於過去新疆主政者處理新疆民族問題不當，造成民族間的衝突，盛世才認為不能再以傳統的方式來治理新疆，希望用現代化且有效率的方式來管理，<sup>62</sup>所以採用「六大政策」以適合新疆特殊需要，建設新疆。盛世才稱「六大政策」提出的目的是「粉碎帝國主義，尤其是日帝國主義對新疆之陰謀，及鞏固中國西北門戶，把落後的新疆變為中國先進之模範省份。」<sup>63</sup>中共則認為六大政策和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低綱領基本一致，又和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國綱領」大體相符，可構成中共和盛氏合作的政治基礎，<sup>64</sup>故新疆遂成為中共注意的目標，六大政策中之「反帝、親蘇」，更激起內地共黨、青年的嚮往，認為新疆是中國最革命的地方。<sup>65</sup>

<sup>56</sup> 〈何應欽致朱紹良、蔣鼎文電文〉（民國29年1月8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6。

<sup>57</sup> 〈蔣鼎文致何應欽電文〉（民國29年1月10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6-27。

<sup>58</sup> 〈何應欽覆蔣鼎文電文〉（民國29年1月16日），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27。抗戰時期，蘇聯援華物資須經新疆運往前線，蔣委員長恐不同意盛世才之請求，會引盛反感，亦曾電朱紹良，「不可再阻留，以免晉庸誤會，請准其通過。」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覆第十八集團軍留新官兵請准其通過〉（民國28年12月31日），轉引自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頁91。

<sup>59</sup> Allen.S. Whiting & General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t. II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58), p.156.

<sup>60</sup> F.Gilbert Chan, "Sheng Shih-ts'ai's Reform Programs in Sinkiang" *Idealism or Opportunis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民國72年），頁379。

<sup>61</sup> 陳潭秋：〈在新疆工作的任務與工作方針〉，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頁6。

<sup>62</sup> Fook-lam Gilbert Chan, *The Road to Power: "Sheng Shih-ts'ai's Early Years in Sinkiang 1930-34"*,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reprint series No.12.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250.

<sup>63</sup> 六大政策：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建設、和平。盛世才：《六大政策教程》，第2分冊，頁54。

<sup>64</sup> 陸振寰，朱楊桂：〈試論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殊性〉，《黨史研究》，1987年第4期，頁24。

抗戰爆發後，為強化在新疆工作，<sup>66</sup>中共中央派代表與盛世才商談合作。<sup>67</sup>是時新疆正經歷大整肅運動，清理舊體系官僚，急需幹部襄助政務，對中共的要求派員入新工作自表歡迎。民國26年至28年，中共中央先後從新兵營、延安及往返延安與莫斯科間途經新疆的幹部中，調派近百餘名至新疆，盛世才委以各種要職，其中大半安置在政界和文化界。<sup>68</sup>

盛世才雖利用中共人員協助建設新疆，但因新疆仍為國民政府中央統轄下的一省，表面還須與中央維持關係，故派有代表常駐重慶，<sup>69</sup>盛世才以緩和中央觀感與適應新疆社會發展為由，不希望中共人員在新疆宣傳共產主義與發展黨務組織，不能公開黨員身分（稱為「三不原則」），只協助盛世才建設新疆，實行六大政策。<sup>70</sup>事實上，新疆素為蘇聯的禁嚮，不容許新疆落入中共之手，<sup>71</sup>且當時蘇聯亦怕中共在新疆公開活動，引起中、蘇關係緊張，<sup>72</sup>也不願中共在新疆發展組織；而中共處在盛世才的地盤上，為能在新疆取得合法地位，建立新疆這條國際交通線，<sup>73</sup>所以表面上還是遵守「三不原則」，所持理由是（一）新疆今天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的基礎；（二）新疆這樣複雜的政治環境也絕不適宜有黨的組織。<sup>74</sup>其實是時機尚未成熟。

中共駐新疆人員自稱是受黨的命令而來，是要幫助執行六大政策，鞏固六大政策政權，<sup>75</sup>故推崇六大政策是最適合於新疆目前條件的革命政策，<sup>76</sup>自稱即令新疆完全交給中共治

<sup>65</sup> 安寧：《新疆內幕》，頁72。

<sup>66</sup> 民國26年10月，陳紹禹、康生等乘坐蘇俄重型飛機，經新疆返延安，機上帶有大型無線電台和高射砲等防空武器。這是中日戰爭開始後，蘇聯對中共的初次援助，中共預料今後「國際援助」將源源而來，心中大喜，所以在新疆工作很重要。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247。

<sup>67</sup> 安寧：《新疆內幕》，頁110。

<sup>68</sup> 如毛澤民（化名周彬）任財政廳長；徐孟秋（化名孟一鳴）任教育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汪小川（化名汪嘯春）任新疆日報社長兼新疆公安管理處職員訓練班教官；黃火青（化名黃民孚）任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等。

<sup>69</sup> 陸振寰，朱楊桂：〈試論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殊性〉，《黨史研究》，頁26。

<sup>70</sup>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3991。

<sup>71</sup> 同前註，頁4013。

<sup>72</sup> 趙明：〈盛世才與中國共產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8年第2期，頁40。

<sup>73</sup> 黨育林、張志安：〈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統戰關係的建立及其特點〉，收錄於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頁291。

<sup>74</sup> 趙明：〈盛世才與中國共產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8年第2期，頁39。

<sup>75</sup> 民國29年4月20日，陳潭秋給各地工作同志的指示信。見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1933-1949）》（新疆：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8月，第1次印刷），頁49。

<sup>76</sup> 陳潭秋：〈在新疆工作的任務與工作方針〉，《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頁6。

理，根據客觀條件，也只能施行六大政策。<sup>77</sup>因此，非但不應提出與新疆政府對立的主張，相反的應忠於該政府，徹底執行六大政策。<sup>78</sup>但實際上中共仍以在新疆政府工作的機會，利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簡稱「反帝會」）和《新疆日報》宣傳六大政策、共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馬克思主義。<sup>79</sup>

反帝會成立之初（民國23年）原是一政治性的民眾組織，其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與蘇聯親善，實行新疆各民族一律平等。<sup>80</sup>其任務為：一、遵照孫總理之民族主義，領導全體民眾，確立新疆永久為中國之領土，決意與離間各族間之和平而企圖乘機攫取新疆為殖民地之帝國主義者相抵抗；二、極力擁護新疆現政府，領導全體民眾，一致起來抵抗世界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sup>81</sup>著重民族平等驅逐帝國主義，冀求新疆和平。至民國24年，六大政策制定後，反帝會成為團結反帝群眾、擴大反帝宣傳、執行六大政策的政治組織，一切工作完全以六大政策為出發點。<sup>82</sup>

中共入新後，將群眾組織的反帝會改為統一戰線的組織，盛世才仍是會長，但真正領導權則握在中共手中。民國27年，西路軍幹部黃火青出任秘書長，進行第二次改組，<sup>83</sup>把原有八部合併為組織、宣傳、民眾、聯絡四部，調中共黨員擔任部、科領導，<sup>84</sup>指示各地中共黨員要盡可能加入反帝會，以六大政策立場積極推動反帝會工作，提高會員政治理論水準，造就大批六大政策幹部，<sup>85</sup>後來伊寧事變（民國33年11月）的骨幹，都是這一時代教育出來的青年。<sup>86</sup>反帝會會員人數和組織機構較前大增，民國26年會員有5,281人，至民國28年，

<sup>77</sup> 陳澤秋在民國28、29年兩次指示信。見新疆自治區檔案局：《檔案史料選編(-)》，轉引自黨育林、張志安：〈中國共產黨與盛世才統戰關係的建立及其特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頁288。

<sup>78</sup> 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頁32。

<sup>79</sup> 中共哈密地委黨史辦公室：〈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人在哈密〉，《哈密文史資料》，第1輯（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頁72。

<sup>80</sup> 何語竹，康炳麟：〈關於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及其它〉，《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1985年8月第1次印刷），頁38。

<sup>81</sup> 〈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組織章程〉，轉引自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資料彙編》（烏魯木齊：新疆青年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頁60。

<sup>82</sup>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3577。

<sup>83</sup> 反帝會第一次改組在民國24年7月，聯共王壽成（俞秀松）任秘書長，不少聯共黨員被安排入會。

<sup>84</sup> 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頁86。

<sup>85</sup> 趙明：〈盛世才與中國共產黨〉，《新疆烈士傳通訊》，1988年第2期，頁39。

<sup>86</sup>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3569。

<sup>87</sup> 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資料彙編》，頁202-203。

<sup>88</sup> 同前註，頁65-69。

會員人數已有一萬餘人以上，增加一倍左右；各地計有27個區會，118個區分會，33個直屬分會，24個直屬小組，遍及新疆各地。<sup>87</sup>民國28年修改章程，增加許多內容，如要鞏固發展以蘇聯為中心的反法西斯之和平陣線，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抗戰後方，援助前方，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發展抗戰，堅持抗戰到底，<sup>88</sup>表明它已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在南疆稱為「抗日後援會」。<sup>89</sup>中共利用這組織宣傳抗日、訓練和組織群眾，反映這些工作的有：出版《反帝戰線》刊物、定期舉行小組會議、開設訓練班，譯載馬克思、列寧著作，<sup>90</sup>以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為討論題材，講授教材。<sup>91</sup>每位會員都談辯證法、唯物論，可見反帝會名為研究六大政策，實際上是宣傳馬列主義。

民國27年2月，汪小川（化名汪嘯春）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sup>92</sup>中共即掌握了《新疆日報》，改變編輯方向，使成為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報紙，<sup>93</sup>除了選擇性登載幾條中央社的電訊消息外，大量刊登新華社、蘇聯塔斯社的電訊，<sup>94</sup>加強宣傳馬列主義的基本常識，連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著作，登載〈模範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長篇文章，報導華北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及游擊區情況；<sup>95</sup>新四軍事件發生，並發表〈新四軍皖部慘被殲真相〉等社論，強烈譴責中央，<sup>96</sup>《新疆日報》成為中共在新疆的宣傳工具。

## 伍、盛世才與中共關係的惡化

盛世才與中共合作是透過蘇聯建立起來的，所以盛世才與蘇聯關係惡化，直接影響到盛世才和中共的關係。

民國28年歐戰爆發，蘇聯為加強戰備，要求在新疆獲取更多的權益，29年逼迫盛世才

<sup>89</sup> 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其特點〉，《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頁194。

<sup>90</sup> 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資料彙編》，頁45-47。

<sup>91</sup> 魏中天：《盛世才如何統治新疆》（香港：海外通訊社，民國36年4月5日出版），頁12。

<sup>92</sup> 社長是聯共派來的王寶乾，汪小川是實際負責人。

<sup>93</sup>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頁42。

<sup>94</sup> 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頁79。

<sup>95</sup>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新疆簡史》，第3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頁279。

<sup>96</sup> 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12。

<sup>97</sup> 蘇聯單方面擬就該約，強迫盛世才一字不改而予以簽訂。依該約有效期限五十年內，蘇聯在新疆有採礦特權，免繳關稅；享有新疆河流湖沼捕魚權；有權利用一切自然資源；蘇聯聘來之人員可自由進入新



簽訂「租借錫礦條約」，<sup>97</sup>嚴重侵害中國主權。對於蘇聯的步步進逼，盛世才倍感威脅，因其時新疆尚須蘇聯援助，所以盛世才對中共只能採取疏遠辦法。

盛世才首先安排大批中共人員往南疆工作，如新疆學院教務長林基路調庫車縣長、反帝會秘書長黃民孚調阿克蘇行政長，名義上是請這些人把宣傳帶至民間，實際是將其送至語言、生活習慣與漢人迥異的地區予以隔離，<sup>98</sup>南疆又堅決反蘇、反共，中共很難在該地發展，使其陷於孤立狀態。盛世才並常以有病為由，拒絕與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見面；<sup>99</sup>至民國29年5月開始拘捕親蘇親共勢力，包括杜重遠等親中共分子，及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歐傑陽克（Oujayank）等，藉以削弱共產黨在新疆的力量；民國31年減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撥給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招待費。<sup>100</sup>同時盛世才提出「六大政策集團」、「新疆不是國民黨天下，也不是共產黨天下」，<sup>101</sup>表示六大政策是獨立的政治集團；宣稱「共產黨在口內（延安）是需要的，在新疆絕不需要，如有人介紹你入共產黨，那人必然是托派。」<sup>102</sup>矛頭指向在新疆的中共黨員。

對於新疆省政局的變化，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雖有察覺，但基於盛世才常對他說，政治問題是以兩個中心的態度為標準，即是國際問題看莫斯科，國內問題看延安。認為盛世才親蘇與中共合作的總方針是不會馬上改變的。<sup>103</sup>因此提出挽救新疆危局意見，如設法揭露不利於盛世才的陰謀企圖，加強在新疆工作同志的策略教育，及將盛世才不滿意的同志送回延安等方式，<sup>104</sup>試圖減少盛的疑忌，改善盛世才與中共的關係。

然民國30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蘇聯為加強戰備，急迫需要石油，逼迫盛世才簽訂合辦獨山子油礦。<sup>105</sup>蘇聯對新疆壓迫，使盛倍感威脅，及至31年3月19日，其四弟盛世騏被一受蘇聯及中共操縱的陰謀組織暗殺隕命，<sup>106</sup>盛世才澈底覺悟，深悔藉外力護位，換得手足被

---

疆，……等。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臺北：外交部，民國39年7月1日），頁39-45。

<sup>98</sup>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4012。

<sup>99</sup> 陳潭秋：〈關於新疆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轉引自《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29。

<sup>100</sup> 張志安：〈試析我黨與盛世才統戰關係的破裂及其原因〉，《實事求是》，1987年第3期，頁63。

<sup>101</sup> 轉引自安寧：《新疆內幕》，頁72。

<sup>102</sup> 陳潭秋：〈迪化新省情況報告〉（1939年11月28日），轉引自《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15。

<sup>103</sup> 陳潭秋：〈新疆情形概略報告〉（1941年11月6日），轉引自朱培民：《新疆革命史略（1933-1957）》，頁155。

<sup>104</sup> 同前註，頁154-155。

<sup>105</sup> 獨山子油礦，於民國28年開始經營，並無任何協定或合同，僅由蘇方口頭商議，即行開採。見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頁78。

<sup>106</sup> 蘇聯計劃在民國31年4月12日舉行暴動，推翻盛世才，參與人員有蘇聯在新工作人員、領事、顧問、教官等，及中共在新各部門工作人員。此計畫之先，因四弟盛世騏被刺身死，遂將全案破獲，未及成事。

殺，決定反蘇反共。

當然中央亦不滿意中共在新疆發展，但為取得蘇援下，不得不忍讓，珍珠港事變後中美同盟，加以蘇聯停止對華援助，中央解決新疆問題就無所顧忌。蔣委員長認為只有先解決新疆，才能解決中共，<sup>107</sup>為切斷中共與蘇聯的國際通道，開始在甘肅酒泉一帶建築國防工事。<sup>108</sup>中央軍隊駐守新疆邊界，予盛世才擺脫蘇聯羈絆的機會，中央與新疆關係得以進展，而在新疆工作的中共人員的處境則十分危急。

此時陳潭秋已意識到中共在新疆地位危急，但中共中央以為哈密駐有蘇軍紅八團，盛世才不會全面反蘇反共，除指示對盛態度不應過於尖銳，並應繼續採取積極政策，以緩和雙方關係外，<sup>109</sup>對新疆問題始終未給具體指示。

民國31年6月，盛世才為改善和中央的關係，派其五弟盛世驥至重慶商洽新疆問題，盛世才在盛世驥返回迪化後，決採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將西路軍留新疆工作幹部和其他共產黨員，以「另有任用」為名，陸續由各區、縣調回迪化，<sup>110</sup>予以逮捕，被逮捕者656名，其中中共黨員321人，88人被判處死刑。<sup>111</sup>

31年7月5日，朱紹良代表蔣委員長至迪化，與盛世才商談，達成「防止中共在新疆擾建新根據地」的協定，<sup>112</sup>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在一起。中共眼見大勢已去，無法在新疆繼續工作，陳潭秋請求中共中央迅速解決在新黨員的行動問題，中共中央指示除督辦留下的4人外，其餘136人準備向蘇聯撤退。<sup>113</sup>

當時正是德蘇戰爭吃緊，蘇聯急需英、美的支持，並需與中國維繫友好關係，對於新疆只能尋求和平方法解決，故決定派外交部副部長狄卡諾索夫（Dekanozov）至迪化調整盛、

「盛世才陳報新省政情六項」（民國31年7月10日），〈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3卷，《總統蔣中正檔案》，國史館藏。

<sup>107</sup>〈任弼時陳潭秋電〉（1942年5月7日），轉引自朱培民：《新疆革命史略（1933-1957）》，頁150。

<sup>108</sup>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102。

<sup>109</sup>中共烏魯木齊市委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160。

<sup>110</sup>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頁151。

<sup>111</sup>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240. 另見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民國40年12月7日），版3。

<sup>112</sup>「朱紹良與盛世才長談情形條列」（民國31年7月11日），〈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4卷，《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13</sup>電文稱因由蘭州、西安回延安無保障。〈中共中央關於準備撤回在新工作人員的指示電〉（1942年7月5日），轉引自《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56；《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頁13。

<sup>114</sup>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1933-1949）》，頁83。

蘇關係，所以遲至9月7日才來電，同意在新疆中共人員分批撤入蘇聯。<sup>114</sup>為時已晚，因8月29日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代表蔣委員長訪問迪化時，已指示盛世才「肅清新疆共黨」，<sup>115</sup>故盛世才已不可能放人，乃將在新疆的中共人員、家屬，藉口以「容易保護與免被國民黨發現」為由，<sup>116</sup>分別捕押拘禁，使得新疆中共人員處境日益困難，陷於東歸不得，西去不能的窘境。

直到民國34年4月，張治中（時任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受周恩來囑託，允諾設法營救被盛世才關押在迪化監獄的共產黨人，<sup>117</sup>此批人員始於35年7月返回延安。

## 陸、結 論

民國25年西安事變之前，中共侷促於陝北等地，物資缺乏，遭受中央軍圍剿，處境困難，乃打著抗日旗幟，轉移中央目標，利用盛世才親蘇政策，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以為打通新疆，意味著打通蘇聯，可以取得蘇聯在軍事、經濟上的物資援助，解決其戰略地位優勢；而盛世才並提供入新西路軍餘部物資、武器，為其培訓軍事、技術人才，使中共在抗戰期間，力量得以持續發展，對困境中的中共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共在新疆實行「三不原則」，是雙方讓步和妥協的結果。就中共而言，由於盛世才堅持抗日及施行六大政策，共產黨為了政治思想上能保持獨立性下的妥協；就盛世才而言，基於向蘇聯示好，他讓西路軍餘部進入新疆休養生息，學習軍事技術，訓練幹部，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允許中共幹部出入新疆。

盛世才為鞏固在新疆的統治，需要中共的幫助，但又怕中共接近群眾，在群眾中取得信仰。中共不了解盛世才之用意，更不了解新疆的環境，在新疆積極爭取群眾，宣傳反日、馬列主義，雖不發展組織，但在群眾中取得信仰，影響日益增加，使盛世才坐立不安。盛世才除對中共誘以利祿外，並予以監視，當時新疆警務處檔案〈中共活動卷〉記稱：「延安派代

<sup>115</sup>〈困勉記〉，卷73（民國31年8月20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16</sup>〈陳潭秋關於新疆外交權交國民黨並對我可能驅逐電告任弼時〉（1942年9月9日），轉引自《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頁60。

<sup>117</sup>鄧穎超序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sup>118</sup>警務處檔案〈中共活動卷〉，第6號上冊，（民國27年8月6日），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頁3999。

表與蘇聯領事經常接洽，據統計自（民國27年）5月7日至6月2日該代表至蘇聯領事凡十一次。」<sup>118</sup>盛世才是不會允許中共赤化新疆的，否則其將無立足之地，必須削弱彼等力量。故中共與盛世才關係的惡化，除因盛世才與蘇聯關係發生變化外，另與中共在新疆的活動威脅盛氏的政權有莫大關係。

盛世才為使蘇聯竭誠助新疆加速建設，實行親蘇政策，曾謂：「親蘇政策不是要共黨，是保持新疆永遠為中國的一省。」<sup>119</sup>所以盛世才雖擢用中共人員，並採取符合中共要求之最低標準的措施，但又不容其過分活動，故對在新疆中共人員諸多限制，中共中央駐新疆第二任代表鄧發告誡其黨員謂「盛世才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其本質是軍閥。」<sup>120</sup>盛世才與中共合作的真正目的，是以此為權宜之計，維持自身的利益。然而此目的不僅使新疆成為中共的交通站，且為中共獲得蘇聯接濟的樞紐，使共軍在抗戰時期的勢力得以持續發展，對此盛世才亦不否認應負責任。<sup>121</sup>

---

<sup>119</sup> 轉引自陳紀滢：《新疆鳥瞰》，頁203。

<sup>120</sup> 轉引自康立澤：〈光輝的業績，難忘的教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頁53。

<sup>121</sup> 盛世才：《關於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代表艾拜都拉先生第四三二號提案之申辯》（民國43年3月23日），頁11。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特交檔案——新疆問題〉，第53、54卷。〈困勉記〉，第73卷。

### (二) 報紙、期刊：

《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6期。

《新疆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傳記文學》，第53卷第2期、第60卷第4期。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6期。

《民國檔案》，1986年第4期。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14輯。

《烏魯木齊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

《新疆烈士傳通訊》，1988年第2期、1990年第1期、1991年第4期。

《黨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7年第4期。

《哈密文史資料》，第1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

《實事求是》，1987年第3期。

《中央日報》（南京版），民國25年。

《自立晚報》，民國40年。

### (三) 專書：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民國77年5月，10版。

蔡國裕，《中共黨史——延安時期》，第二冊。臺北：國史館，民國79年6月。

- 盛世才，《目前政府主要任務》，第二部。新疆：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民國30年9月18日，改訂3版。
- 盛世才，《六大政策教程》，第二分冊。新疆：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民國31年4月1日。
-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0年11月30日。
-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1年2月。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次印刷。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次印刷。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
- 安寧，《新疆內幕》。新加坡：創墾出版社，1952年8月19日，初版。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58年9月。
-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95輯——西安事變史料(上)、(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72年3、6月。
- 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 中共烏魯木齊市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左支隊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 空軍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天山風雲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 秦野風等著，《國共合作的過去與未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 竹內實編，《轉形期の中國》。日本：京都大學，1988年3月。
-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7冊。臺北：蘭溪出版公司，民國69年10月。
-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黨史資料》，第25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 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1933-1949）》。新疆：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新疆冤獄始末編寫組，《新疆冤獄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資料彙編》。烏魯木齊：新疆青年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魏中天，《盛世才如何統治新疆》。香港：海外通訊社，民國36年4月5日出版。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新疆簡史》，第3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中華民國外交部，《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臺北：外交部，民國39年7月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盛世才，《關於國民大會第一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代表艾拜都拉先生第四三二號提案之申辯》。民國43年。

陳紀澄，《新疆鳥瞰》。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2年5月，臺2版。

Allen.S.Whiting&General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 Pawn or Pivot ? ,Pt II*,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8.